

被隱藏的聯繫性： 《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

曾守正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四庫全書總目》為中國重要的圖書目錄，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問世以來，學者多從刊誤、補正、糾謬等等文獻學角度或方法予以研究，並取得許多重要的成果。直至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研究方向逐漸轉移，學者開始關注該書所呈現的文化內涵與思想，本文即延續此一取向，以其文學史敘述為觀察視域，重建四庫館臣在唐代別集提要中的詩歌史圖像、古文譜系，並詮釋其隱含的文學思想。由於《總目》依傍實存書籍而撰寫〈提要〉，此導致整體思想因形式而顯得零散、隱匿，今擬重建其文學史敘述，並尋繹其完整的思想內容，故以「被隱藏的聯繫性」為題，展開討論。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 文學史 別集 古文

被隱藏的聯繫性： 《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

曾守正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四庫全書總目》^①為中國重要的圖書目錄，湖北大學周積明教授曾指出：《總目》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完成以來，即得王昶、周中孚、繆荃孫、餘嘉錫、張之洞等人的推崇，但推崇角度也有值得反省之處^②：「如上所論，雖然無不高度評價《總目》的價值，但皆局限於從目錄學立論，即僅僅把《總目》看作一部體制完善、編制出色的大目錄書……研究者也從刊誤、補正、考核、糾謬上下功夫……但是，僅僅從目錄

① 《四庫全書總目》常或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等名，據大陸學者崔富章先生考證，自乾隆時期以降的二十四種版本，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名者，僅出現於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餘年間；至於《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內容或有出入，故仍應稱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乃《總目》修改定稿之前形成的，而「獨立在《總目》之外存在的許多〈提要〉傳本，相互之間差異甚大。如《四庫全書提要》所載〈提要〉四百六十三篇，跟文淵閣所載比較，不同者二百八十篇，微有不同者四十六篇，合計三百二十六篇，達十分之七以上。」〈提要〉傳本已各自不同，其又與「《四庫全書總目》確實不是一回事。」見氏著：〈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三十六卷第一期，2002年6月。本文採崔氏說法，且後文一律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省稱為《總目》。此外，本文《總目》版本乃據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2月），後不再贅述。

②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書目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97年6月。

學的角度看待、研究《總目》，畢竟視野太狹窄。包容廣闊意蘊豐富的《總目》，決非『簿錄之書』或『目錄學著作』之名可以加以範圍。」故主張從學術文化的角度，重新掌握該書的內涵。

周氏曾藉用法國文化史家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說法，認為《總目》「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品、一種客觀化的精神，因而必蘊含著鮮明的價值取向和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③換言之，在既有目錄學、文獻學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總目》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及其價值取向，應能開拓《四庫》學，乃至乾嘉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據陳曉華觀察，大陸自 1980 年以降，《總目》研究站在傳統補正訂誤、目錄版本的基礎上，已展開經世價值取向、文化價值重估、經學觀、文風觀，乃至研究方法的重新探討，其中如黃愛平、張新民、葉文青、季野、吳承學、王記錄等學者，分別由學術思想、學術方法、小說觀、詩文批評史、史學批評等範圍，從事《總目》文學、史學、經學等方面內在邏輯發展與變化規律的研究，並且掌握思想理路與時代互動性，斐然有成。^④於是，《總目》可被視為一種反映學術思想的客觀文本，研究者有重建其特定價值取向、文化觀念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總目》共有二百卷，集部自卷一百四十八起至二百卷止，內分「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五類，這些〈提要〉都是研究中國文學的重要材料。^⑤〈別集類序〉^⑥云：

③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9 月），頁 56。

④ 陳曉華：〈四庫總目學研究述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138-144。這類總結觀察的論文，見解約略相同，可另參周積明：〈四庫學通論〉，收入氏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265-293；李杰：〈90 年代《四庫總目》研就論文綜述〉，《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1 年第 3 期；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述略〉，《圖書館雜誌》2002 年第 6 期。陳東輝：〈20 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25 卷 2 期，2006 年 5 月。

⑤ 近年關於集部〈提要〉研究，以日本學者笈文生、野村鮎子成果最為豐碩，見氏著：《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 2 月）與《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於張融《玉海》。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畧》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不可傳者，則繫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恒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璣並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這段文獻，表層述說集部圖書的發展，尤其是集部體例與數量的狀況。但其中亦表露某種主觀性，即追求公論標準、慎重去取的企圖。此外，「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之說，更代表四庫全書之纂集，除了為保存文獻外，另有發掘佳著的目的。如此深意，〈集部總敘〉^⑦亦可見之：

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為察相，而以殺楊

院，2006年2月）。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雖帶有譯介性質，但書中「注」、「附記」的部分，頗為精整。又自〈提要〉析出文學觀念，僅見野村鮎子：〈論《四庫提要》如何評論南宋文學〉，收入沈松勤主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頁319-333。

⑥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別集類一，頁4（冊）—12。

⑦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頁4（冊）—1。

繼盛為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姦，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尠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為文體計也。

明代以降，門戶之見愈發顯明，但《四庫全書》的纂集，乃至《總目》的書寫，無一不具有「世道之防」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館臣也多從這個角度省視文學史發展、歸納文學經驗、建立文學史敘述與解釋，甚而形成一套模式。

在上述新興學術氣氛底下，本文擬以別集類〈提要〉為主要研究材料^⑧，嘗試建構《總目》唐代詩歌、古文的歷史圖像，並討論其內部思想，以期填補文學思想、四庫學研究的空隙。此外，《總目》依傍實存書籍而撰寫〈提要〉，此導致整體思想因形式而顯零散、隱匿，今重建其文學史敘述並思繹思想內容，實為追求「被隱藏的聯繫性」，故以之為名。^⑨

⑧ 《總目》唐代別集類收錄文籍的狀況為：著錄書共三卷，收錄九十五部著作；存目書見於「別集類存目一」部分，收錄二十六部著作，其中又多為唐後注本，如【明】林兆珂《李詩鈔述註》、舊題【元】虞集《杜詩註》、【明】單復《讀杜愚得》等等。分見《總目》，卷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一、集部二、別集類二至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24-88；《總目》，卷一百七十四、集部二十七、別集類存目一，頁4（冊）—606-615。此外，《總目》作者向為爭論議題，本文暫不細論，唯將《總目》視為官方論定的集體著作，並以整體視之，故在別集類唐代〈提要〉不足申述時，則適度援引他類〈提要〉補證。

⑨ 此有兩項研究立場尚需說明：第一、本文以新歷史主義理論「歷史文本為文學虛構的文本」為基本假設，至於細部討論，請參見拙著：《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9月），頁32-46。第二、日本學者今村仁司在閱讀矢代梓《二十世紀思想史年表》後曾指出，年表著作有許多等待解釋的空白，而這些空白本是年表的特質，故其間的聯繫應由讀者自己找出，換言之，年表作者可能埋下「被隱藏的聯繫性」。事實上，《總目》雖不以「年」為經，但以「書」為經，其聯繫性、整體性自不若專著顯明，本文借今村氏觀念為題名。今村文見【日】矢代梓：《二十世紀思想史年表》〈前言 笠井《二十世紀思想史年表》的妙趣所在〉（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年1月），頁8-14。

二、詩歌史圖像及其意義

唐詩史分期的問題，自宋以降便是一個複雜的課題^⑩，館臣運用了初、盛、中、晚的基本分法，同時也出現了幾個重要的年號：貞觀（627--650）、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大曆（766-779）、貞元（785-805）、元和（806-820）、長慶（821-824）、天祐（905-907）等，四唐稱謂與各年號指陳是否有包含關係，還待進一步考察，此處姑且不論，但從四唐稱謂與年號指陳，可以建構出館臣的詩歌史圖像^⑪，以下臚列數則文獻，以資建構：

A.〈東臯子集提要〉^⑫：

（王績）詩惟〈野望〉^⑬一首，為世傳誦。然如〈石竹詠〉^⑭，意境高古；〈薛記室收過莊見尋詩〉二十四韻^⑮，氣格道健，皆能滌初唐俳偶板滯之習，置之

⑩ 這個問題直到二十世紀，依舊眾說紛紜，參見張紅運：〈二十世紀唐詩分期研究略述〉，《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⑪ 唯館臣對於四唐的起迄時間，並無明確界定，本文約略參對年號，將玄宗開元之前定為初唐，開元、天寶至代宗大曆為盛唐，德宗貞元到穆宗長慶為中唐，敬宗寶歷到昭宣帝天祐為晚唐。作家的生平，不可能被年號起迄統一區畫，故在歸屬上容有出入，尤其是中晚唐之間，別集類〈提要〉更為模糊，所以本文四唐時間實為一權宜區分。

⑫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4。

⑬ 《東臯子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中，〈野望〉：「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⑭ 《東臯子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中，〈石竹詠〉：「萋萋結綠枝，曄曄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

⑮ 《東臯子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伊昔遭喪亂，歷數閱當餘。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吾及爾皆亡，東西各異居。爾為背風鳥，我為涸轍魚。逮承雲雷後，欣逢天地初。東川聊下釣，南畝試揮鋤。資稅幸不及，伏臘常有儲。散誕時須酒，蕭條懶向書。朽木不可雕，短翮將焉摠。故人有深契，過我蓬蒿廬。曳裾出門迎，握手登前除。相看非舊顏，忽若形骸疎。追道宿昔事，切切心相於。憶我少年時，攜手遊東渠。梅李夾兩岸，花枝何扶

開元、天寶間弗能別也。

B. 〈劉隨州集提要〉¹⁶：

（劉）長卿詩號五言長城，大抵研鍊深穩，而自有高秀之韻。其文工於造語，亦如其詩，故於盛唐、中唐之間，號為名手。但才地稍弱，是其一短。

C. 〈杼山集提要〉¹⁷：

皎然及貫休、齊己皆以詩名，今觀所作，弱於齊己而雅於貫休，在中唐作者之間，可廁末席。

D. 〈唐英歌詩提要〉¹⁸：

以文章工拙論之，則（吳）融詩音節諧雅，猶有中唐之遺風，較偃為稍勝焉。在天祐諸詩人中，閒遠不及司空圖，沈摯不及羅隱，繁富不及皮日休，奇闢不及周樸，然其餘作者，實罕於雁行。

E. 〈追昔遊集提要〉¹⁹：

（李）紳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句。今觀此集，音節嘽緩，似不能與同時諸人角爭強弱。然春容恬雅，無雕琢細碎之習，其格究在晚唐諸人，刻畫纖巧之上也。

F. 〈雲臺編提要〉²⁰：

方回《瀛奎律髓》又稱（鄭）谷詩多用僧字凡四十餘處，谷自有句云「詩無僧字格還卑」，此與張端義《貴耳集》謂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者，同一雅中之俗，未可遽舉為美談。至其他作，則往往於風調之中獨饒思致。汰其

疏。同志亦不多，西莊有姚徐。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嘗學公孫弘，策杖牧群豬。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虛。人生詎能幾，蹙迫常不舒。賴有北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遣，自覺塵累祛。何事須筌蹄，今已得免魚。舊遊儻多暇，同此釋紛拏。」

¹⁶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43。

¹⁷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42。

¹⁸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82-83。

¹⁹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64。

²⁰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80。

膚淺，擷其菁華，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G. 〈韓內翰別集提要〉²¹：

（韓偓）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

H. 〈元英集提要〉²²：

何光遠《鑑戒錄》稱（方）幹「為詩鍊句，字字無失，詠繫風雅，體絕物理」（孫）郈〈傳〉亦稱其「高堅峻拔」，蓋其氣格清迥，意度閒遠，於晚唐纖靡俚俗之中，獨能自振，故甚為一時所推。然其七言淺弱，較遜五言。

I. 〈毘陵集提要〉²³：

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

J. 〈錢仲文集提要〉²⁴：

大歷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關，十子實為之職志。（錢）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然溫秀蘊藉，不失風人之旨，前輩典型，猶有存焉。

K. 〈白蓮集提要〉²⁵：

唐代縉流，能詩者眾，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貫休及齊己。皎然清而弱，貫休豪而粗，齊己七言律詩不出當時之習，及七言古詩，以盧仝、馬異之體縮為短章，詰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詩居全集十分之六，雖頗沿武功一派，而風格獨道。如〈劍客〉〈聽琴〉〈祝融峰〉諸篇，猶有大歷以還遺意。其絕句中，〈庚午年十五夜對月詩〉曰：「海澄空碧正團圓，吟想元宗此夜寒。玉

21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81。

22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83。四庫本《元英集》本作《玄英集》，《總目》因避諱改「玄」為「元」。

23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44。

24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46。

25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86。

兔有情應記得，西邊不見舊長安。」惓惓故君，尤非他釋子所及，宜其與司空圖相契矣。

L. 〈黃御史集提要〉²⁶：

（黃滔）集中文頗瞻蔚，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遺，雖不及羅隱、司空圖，而實非徐寅諸人之所及。

M. 〈樊川文集提要〉²⁷：

平心而論，（杜）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視長慶體矣。

通過這數則文獻，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詩史圖像：初唐作品大抵為「俳偶板滯」習尚（A），此乃沿襲六朝風格（I）而來；開元、天寶詩格一變，轉為「渾厚」（I、J）；大曆以降，初變開元、天寶之「渾厚」，而為「稍趨浮響」（J）；中唐約為「音節諧雅」（D）；至於晚唐，則顯「雕琢細碎」「刻畫纖巧」（E）、「靡靡之響」（G）、「纖靡俚俗」（H）。

（一）初唐俳偶

初唐的風格「俳偶板滯」，實具有負面評價的意味，故館臣刻意挖掘王績「高古」、「適健」的〈石竹詠〉、〈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以補充純由〈野望〉定位王績的不足。〈野望〉為五言律詩，屬藉山水田園生活景色，抒發人生情志的作品，但「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仍著跡於刻意排偶。至於〈石竹詠〉，藉詠物而詠懷，此從《詩經》比興傳統或漢賦體物言志的傳統來看，自可謂為「高古」。〈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則述人生艱辛，以及朋友乖違、重聚之

²⁶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84。

²⁷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70。

慨，情感直接興發，以「遒健」稱之。從語脈看來，「高古」、「遒健」亦是館臣認為盛唐詩的重要風格。至此，只追求語言排偶，失去情志興發感動者，自非館臣心中佳作。

當然，唐初是中國詩歌律化的重要階段，律化因漢字形、音、義獨立的特色，發展出字義、詞性對偶的規則外，並將聲調簡化為平仄，錯綜安排，造成聲音疊代之美，此與太康、永明等文學發展，密切聯繫。館臣面對歷史的連續性，雖對唐初「俳偶」積習提出批判，但未全然反對律化過程中所生發華美取向，所以，〈盈川集提要〉²⁸針對《新唐書》作者宋祁的古文立場²⁹，也提出批評：

《舊唐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楊）炯之麗製，不止此篇。劉昫殆以為奏御之作，故特加紀錄歟。〈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遊談，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新唐書》本〈傳〉刪之不載，蓋猶〈本紀〉不載詔令之意，是宋祁之偏見，非定評也。

如此可知，華麗的語言是否流於「浮華」，其判準在於是否「貫穿典籍」。如此看法，亦出現於同為四傑之首的王勃評論中，〈王子安集提要〉³⁰：

勃文為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艷。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張燕公嘗讀勃〈夫子學堂碑頌〉『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案一公謂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洪邁《容齋隨筆》亦

²⁸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7。

²⁹ 兩《唐書》的立場差異，請參見拙著：〈歷史圖像與文學評價的疊合--兩《唐書》文學類傳「時變」思想的落差〉，《政大中文學報》，第四期，頁29-58。

³⁰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6。

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麗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詞。」註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絕古今，杜甫、韓愈詩文亦冠絕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白戰之徒，掇拾語錄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動其喙，殆所謂蚍蜉撼樹者歟！今錄勃集，併錄成式及邁之所記，庶耳食者無輕詆焉。

館臣刻意記錄唐僧一行、段成式、杜甫、韓愈的評語，說明以「浮豔」視王勃者，實為至淺之見。其中，一行從典故實學說之，又與〈盈川集提要〉契合。因此，俳偶雖是時流表現，但詩若能彰顯典籍故實、興寄情志，亦受正面評價。此外，館臣在唐代別集〈提要〉中，數次引述、評論兩《唐書》載錄，但兩《唐書》對律化的重要推手沈佺期、宋之問多有論述，《總目》卻使之缺席，此或因《總目》未收彼等文集，抑或對華麗文風的內在性，未予特別關注，此屬《總目》未明言部分，本文暫不考索。

（二）盛唐渾厚

《總目》別集類提要對於盛唐詩以「渾厚」簡潔稱之，至於如何為「渾厚」，則未見說明。以「渾厚」說盛唐詩，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曾云³¹：

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為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

³¹ 【宋】嚴羽：《滄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

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腳根未點地處也。

黃景進先生認為嚴羽所論的盛唐風格「渾厚」，應是取李、杜詩為標準³²。黃先生的意見，除了符合嚴羽詩論的精神，也通貫於館臣的理解。但是，館臣對於嚴羽詩論的整體理解，卻未全然肯定。〈滄浪詩話提要〉³³云：

大旨取盛唐為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為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宗。而馮班作《嚴氏糾謬》一卷，至詆為囋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競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輒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

館臣指出《滄浪詩話》詩學極則在於「妙悟」，而其精蘊來自於盛唐之詩。次而指出明、清學者的評論，或以「達摩西來，獨闢禪宗」頌之³⁴，或以囋語毀之³⁵。

然館臣認為嚴羽之作在於對治時代詩病，即宋詩流於宗派之爭，且四靈派盛行，

³² 嚴羽的詩論，後人受到王士禎的影響，認為「興趣」即為「神韻」，故誤認嚴羽推崇者應是王、孟，而非李、杜，此從〈詩辯〉「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足為證明後人誤認的狀況。參見黃景進：《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2月），頁221-225。

³³ 《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頁5（冊）—236。

³⁴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讀昌黎毛穎傳〉：「韓序、記、書、啓，如達摩西來，獨啓禪宗。」乃指韓文而言，應非館臣所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五，頁1290（冊）-760。惟〈題庚溪詩話後〉謂宋朝南渡以後，「嚴羽卿以譚藝雄古」，卷一百六，頁1290（冊）-769；又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一：「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皆對嚴羽多持肯定態度。此外，胡應麟：《詩藪》，〈雜篇〉，卷五：「南渡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煙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革，大暢玄風。」

³⁵ 【清】馮班：《鈍吟雜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嚴氏糾謬〉，頁886（冊）-552-558。

推崇晚唐之詩。換言之，館臣肯定滄浪對四靈詩的批判，但以妙悟為詩之極則者，則有所保留。〈滄浪集提要〉³⁶云：

司空圖《詩品》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羽之持論又源於圖，特圖列二十四品，不名一格，羽則專主於妙遠，故其所自為詩，獨任性靈，掃除美刺，清音獨遠，切響遂稀。五言如「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寒」，七言如「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洞庭旅雁春歸盡，瓜步寒潮夜落遲」皆志在天寶以前，而格實不能超大歷之上。由其持「詩有別才，不關於學。詩有別趣，不關於理」之說，說止能摹王、孟之餘響，不能追李、杜之巨觀也。

館臣認為《滄浪詩話》僅擷取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鑄成「妙悟」諸說，其反映於實作上，如〈訪益上人蘭若〉、〈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客中別表叔吳季高〉³⁷諸句未見美刺，徒具「清音獨遠」，乃為王維、孟浩然一路者。這看法同樣反映館臣對王士禎³⁸的評議，館臣認為「士禎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為宗。」又「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³⁹「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二十四詩品》「含蓄」品內容，館臣認為此非司空圖的詩學極則，今若僅以「含蓄」「纖穠」鑄為「範水模山，批風抹月」的「神

³⁶ 《總目》，卷一百六十三、集部十六、別集類十六，頁4（冊）—306。

³⁷ 這三段摘句，惟第二首在《滄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晴江水落長疑雨，暗浦風生欲上潮」與此處不同。又，與《總目》引錄相同者為【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³⁸ 王士禎之名，《總目》作「士禎」，其原因：「士禎初名士禎，卒後，以避世宗諱，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與沈德潛論詩，及士正，諭曰：『士正續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派較正，宜示褒，為稽古者勸。』因追諡文簡。三十九年，復諭曰：『士正名以避廟諱致改，字與原名不相近，流傳日久，後世幾不復知為何人。今改為士禎，庶與弟兄行派不致淆亂。各館書籍記載，一體照改。』」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1），卷二百六十六、列傳五十三、〈王士禎傳〉，頁9954。本文徵引文獻時，則依文獻原樣表示；非徵引文獻時，則以原名行文。

³⁹ 〈精華錄提要〉，《總目》，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別集類二十六，頁4（冊）—584-585。

韻」派，並以王維、孟浩然為盛唐之主，則有偏頗之虞⁴⁰。綜上可知，館臣主張文學需具美刺效能，否則難得「切響」；而嚴羽、王士禛和他們的妙悟、興趣、神韻諸說，都有虛乏的地方。

當然，這也不意味館臣完全隱落王、孟詩的價值與地位。〈儲光義詩提要〉云：「其詩源出陶潛，質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於王維、孟浩然間，殆無愧色。殷璠《河岳英靈集》稱其『削盡常言，得浩然之氣』，非溢美也。」⁴¹又〈常建詩提要〉云：「歐陽修〈題青州山齋〉又極賞其『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稱欲效其語，久不可得。案修集本作『竹徑遇幽處』，蓋一時誤記。姚寬《西溪叢話》已辨之。今據建集改正，附識於此。然全集之中，卓然與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就此說來，王、孟是盛唐的重要作家，所以館臣以之評量詩人成就。王、孟一派特色，與陶潛詩具有源流關係，「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題破山寺後禪院〉）堪為代表詩句。何以「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足為代表呢？歐陽修認為這是一種景物出現於眼前，而作者能以自然的方式，展現景物精神，並且與心意闇合的美好表現⁴²。宋胡仔《漁

⁴⁰ 〈詩品提要〉云：「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見《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頁5（冊）—219-220。此外，自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二先生提出〈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開始，學界對《二十四詩品》就出現四種學術態度，其一認為《二十四詩品》出自明懷悅《詩家一指》，其二認為《二十四詩品》出於元虞集之中，其三為對《二十四詩品》舊說保持存疑態度，其四堅信《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者。唯本文旨論《總目》的文學思想，而館臣確信在唐人詩格諸作中，僅《二十四詩品》真正出自司空圖之手，故本文暫不贅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關於此爭論，參見程國斌：〈20世紀司空圖及其《二十四詩品》研究回顧〉，收入蔣述卓、劉紹瑾、程國斌、魏中林等：《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頁315-319；黃念然：《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文論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頁348-325。事實上，陳尚君在1995年以後，已經放棄《二十四詩品》出自明懷悅《詩家一指》的說法了，見氏著：〈《二十四詩品》偽書說再證——兼答祖保泉、張少康、王步高教授之質疑〉，淡江大學主辦「第十屆文學與美學暨第二屆中國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前論文集》，2007年6月21日-22日，頁250。

⁴¹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6。

⁴² 〈題青州山齋〉：「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

隱叢話前集》「常建」條云：「東坡云：『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邪！』」⁴³東坡雖認為這或是歐陽修慣見流俗雕工之語，故反以清淡自然為喜，實有自謙之意。暫且不論歐陽修是否居謙，此表示常建詩句為一種情景交融的自然表現。這種寫法正通於王、孟詩風。

開元、天寶之後，館臣以大曆接續之，並認為此期又是詩格轉變的開端，館臣以「稍趨浮響」稱說。「浮響」具體指涉為何，館臣無進一步說明。在《總目》中，曾以「浮響」稱說文學風格的，另見於〈談龍錄提要〉：「然神韻之說，不善學者往往易流於浮響。施閏章華嚴樓閣之喻，汪琬西川錦匠之戒，士禎亦嘗自記之，則（趙）執信此書，亦未始非預防流弊之切論也。」⁴⁴那神韻末流又何以為淪為「浮響」呢？從〈御選唐宋詩醇提要〉⁴⁵可知：

宋詩又弊，士禎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別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為鈍根。士禎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論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謂歟？

這段文獻在於說明王士禎所面對的詩學環境及其詩學內涵。館臣認為神韻派所宗尚的「盛唐」作家，乃以「王、孟、韋、柳」為極軌（此據王士禎《古詩選》而論），表

將？」【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3月），卷三〈居士外集二〉，頁141。

⁴³ 《漁隱叢話前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九。

⁴⁴ 《總目》，卷一百九十六、集部四十九、詩文評類，頁5（冊）—251-252。

⁴⁵ 《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四十三、總集類五，頁5（冊）—99-100。

現於語言相，則成「品題泉石、摹繪煙霞」之作，此可統稱為「山水清音」。其所以虛歉，在於遺落了孔門《詩》學「興觀群怨」的精神。因此，我們可以推知，大曆「稍趨浮響」的對照組，應是儒家《詩》學精神。這與前揭〈錢仲文集提要〉「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然溫秀蘊藉，不失風人之旨，前輩典型，猶有存焉。」所述，是相吻合的。

〈錢仲文集提要〉曾引述胡震亨對〈江行絕句〉的考辨，此處雖無益於我們理解大曆詩風，但從特別引述的行為看來，館臣參考、重視胡震亨的見解。胡震亨在《唐音癸籤》曾引遯叟詩評⁴⁶云：

詳大曆諸家風尚，大抵厭薄開、天舊藻，矯入省淨一塗。自劉（長傾）、郎（士元）、皇甫（冉、曾），以及司空（曙）、崔（峒）、耿（漳），一時數賢，竅籟即殊，於喁非遠，命旨貴沈宛有含，寫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畝，群釀覆杯，是其調之同。而工於浣濯，自艱於振舉，風幹衰，邊幅狹，崑詣五言，擅場餞送，外此無他大篇偉什歸望集中，則其所短爾。

其中「自艱於振舉，風幹衰，邊幅狹，崑詣五言，擅場餞送」所指，應是詩流為浮響的重要原因：興發不足，風骨衰弱，取材狹礙，文體拘限五言，只多展現餞別送離之情而已。蔣寅先生認為：「大曆時期的人總體上顯現出一種逃避現實、追求個人安逸的苟安心理……這反映在詩中，就是（程）千帆先生說的『著眼用力於寫日常生活，時序的遷流，節物的變化，人事的升沈離合等方面的描繪，貫串於憫亂哀時的情緒中，便形成大曆詩歌的基調』」⁴⁷，準此，那與盛唐「高古」、「遒健」的作品，確實有所不同。

傅璇琮先生指出在大曆時期，詩人「大致可以分為兩大群，一是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那就是錢起、盧綸、韓翃等大曆十才子詩人，他們的作品較多地呈獻當時的達

⁴⁶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評彙七。

⁴⁷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頁10-11。

官貴人。一是以江東吳越為中心，那就是上文所舉的劉長卿、李嘉祐等人，他們的作品大多描寫風景山水。」⁴⁸ 館臣雖未有如此具體的指陳，但傅先生的說法有助於我們掌握館臣的想法，亦即風景山水的描寫，或個人傷感的表現，都是使作品流於「浮響」的重大原因。

綜合〈滄浪詩話提要〉謂嚴羽寫景諸句「切響遂稀」，而其因乃繫於「掃除美刺」，於是我們可說「浮響」與「切響」為一組相對術語，前劣後優，而優劣標準在於詩教美刺。總之，館臣以氣象渾厚做為盛唐詩的特色，其代表人物應是李、杜。王、孟亦為重要作家，卻不若李、杜。此外，《總目》對王昌齡、高適岑參等邊塞詩人，並未特別著墨。

(三) 中唐諧雅

中唐詩風格為何？相較於初唐、盛唐乃至大曆，館臣的說法更為模糊。雖然在評述吳融作品時，有「音節諧雅，猶有中唐之遺風」之說，但這僅從聲律做一形式說明，較為單薄，令人不易掌握。轉視其他〈提要〉，我們可以發現，中唐元、白與韓愈，都是重要的指標人物。

〈劉賓客文集提要〉⁴⁹：

（劉禹錫）其詩則含蓄不足，而精銳有餘，氣骨亦在元、白上，均可與杜牧相頡頏，而詩尤矯出。陳師道稱蘇軾詩初學禹錫，呂本中亦謂蘇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劉克莊《後村詩話》乃稱其詩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十字，差為閒婉，似非篤論也。

〈樊川文集提要〉⁵⁰：

⁴⁸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5月），頁244。

⁴⁹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4。

⁵⁰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69-70。

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蝶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案杜秋詩非艷體，克莊此語殊誤，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新唐書》亦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云云，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為戡誌墓，乃藉以發之，故攄以為牧之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視長慶體矣。

這兩則文獻，將劉禹錫、杜牧與元、白（或長慶體）^{⑤1} 做一比較。就表層說來，元、白當為中唐重要的指標人物。但是，對於元、白的評價，存有貶抑的意味。唐人李肇《唐國史補》云：「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草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⑤2}「淺切」和「含蓄、精銳」有關、「淫靡」與「氣骨」相對。又館臣點明杜牧對李、杜、韓、柳的肯定，藉以對反其薄視長慶體的內涵。順著大曆「稍趨浮響」看來，元和體應是「浮響」的代表了。總之，無論李肇、李戡或杜牧對元、白評論，都具負面義，而館臣述評都偏向負面。

^{⑤1} 在《總目》中，有「元白長慶體」一詞，就〈樊川文集提要〉語脈看來，長慶體亦是針對元白而論的。《總目》，卷一百八十三、集部三十六、別集類存目十，〈超然詩集提要〉，頁4（冊）—904。

^{⑤2} 【唐】李肇：《唐國史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

事實上，歷朝對於元、白詩的價值，各有不同，並非傾倒一端。而劉禹錫曾從「錘鍊」與「自然」的角度，稱美白詩⁵³，他說「精絕百鍊金」（〈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但這些說法，未見館臣提點。因此，情感溫柔婉約而不至淫靡，語言興寄典雅而不流淺切，為一相對於元、白的重要風尚，亦是館臣所期待的佳作標準。

除了元、白外，韓愈亦是指標人物，〈王子安集提要〉云：「杜甫、愈詩文亦冠絕古今」〈孟東野集提要〉：「郊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人自韓愈以下，不推之。」都以韓愈觀點做為證成作家地位的要件。當然，別集類〈提要〉未見論述韓詩的特質、地位和影響⁵⁴，唯參見〈御選唐宋詩醇提要〉⁵⁵，自可得知韓詩在館臣心中的典範地位：

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亦惟兩代之詩最為總雜，於其中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為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國風、二雅，而性情真摯，亦為唐人第一。自是以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崛而不詭於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眾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驚；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既錄杜、韓，可無庸複見。

「奇崛」是韓愈詩的特質，其堪稱唐宋六大家之一，甚而影響江西宗派的發展。這段文獻，應可補充別集類〈提要〉的空白。當然，這段文獻也彰顯出矛盾，即此處白詩是以「平易而最近乎情」受到推崇，因此，《總目》對白居易詩的整體評價還有考察

⁵³ 關於白詩的歷朝評論，參見羅聯添：〈白居易師評論的分析〉，收入氏著《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5月），頁539-579。

⁵⁴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9。

⁵⁵ 《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四十三、總集類五，頁5（冊）—99-100。

的必要，唯此非本文重點，有待日後討論⁵⁶。返回別集類〈提要〉，我們可以清晰掌握館臣的幾個重要批評標準：氣骨、風骨、興託。

此外，還有幾位作家受到館臣的正面評價，如李賀、姚合，而這兩入又有韓孟一派奇創的色彩。〈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提要〉⁵⁷：

賀之為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所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稱「其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劉）辰翁論詩，以幽雋為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

館臣對於李賀詩之奇，以「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說之，即分從創作者的逸出乎常理，以及讀者難以評解闡述。至於詩境，則通於評點家劉辰翁的論詩旨趣「以幽雋為宗」。

至於姚合，〈姚少監詩集提要〉⁵⁸：

然詩家皆謂之姚武功，其詩派亦稱武功體，以其早作〈武功縣詩〉三十首，為世傳誦，故相習而不能改也。合選《極元集》，去取至為精審，自稱所錄為詩家射雕手，論者以為不誣。其自作則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其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始奉以為宗，其末流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遂為論者所排。然由摹倣者滯於一家，趨而愈下，要不必追咎作始，遽懲羹而吹虀也。

⁵⁶ 《總目》是一部集體編纂的著作，亦是依附於文籍而產生的著作，所以，這樣的矛盾是出於集體思想的駁雜？還是為了闡發御定書而發的意見？皆待日後處理。

⁵⁷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61-62。

⁵⁸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70。

館臣認為姚合的特點在於「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刻意苦吟以求古人所未到，亦是出於作意好奇的心態，實為韓詩一系。館臣雖不肯定永嘉四靈末流之作，但四靈等所宗主的姚合，仍有欣賞之意。

總之，中唐已逐步遠離氣象渾厚的盛唐詩風，然盛唐以來的音節諧雅，仍受順承。此外，元、白的淺切與淫靡，為館臣所批評；韓愈奇創一格，為館臣所重視。

(四) 晚唐雕琢

從《總目》別集類〈提要〉看來，晚唐詩風以「雕琢細碎」「刻畫纖巧」、「纖靡俚俗」為主，其受館臣批評。唯華美而能有寄託者，尚能受到稱揚，如李商隱即是。

〈李義山詩集提要〉⁵⁹：

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縟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為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致伶官有擗搯之譏。劉攽載之《中山詩話》，以為口實。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世，作詩者不以為宗。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馬嵬詩〉、〈渾河中詩〉詆為淺近，後江西一派漸流於生硬粗鄙，詩家又返而講溫、李。

〈李義山詩注提要〉⁶⁰：

（朱鶴齡）至謂其詩寄託深微，多寓忠憤，不同於溫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艷之詞，則所見特深，為從來論者所未及。

⁵⁹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70-71。

⁶⁰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頁4（冊）—71-72。

館臣認為世人對溫、李的並稱，多來自他們的綢麗性質，但兩者實有差異。李商隱的詩歌，感時傷事，寄託深微，在在流貫著忠憤之情，保有《詩經》的精神傳統，而溫庭筠則缺少這分質素。此外，李商隱雖曾受到批評、冷落，卻不掩其情志內蘊。這種批評態度，也展現在對韓偓的評論上，館臣說：「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道，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

⑥1 就此看來，李商隱、韓偓的華麗作品，因情志不失，終能匯入詩學正統。

在華麗的主流之外，館臣還表彰了幾位作家，此亦基於「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的開放態度。前引〈唐英歌集提要〉謂吳融詩「在天祐諸詩人中，閒遠不及司空圖，沈摯不及羅隱，繁富不及皮日休，奇闢不及周樸，然其餘作者，實罕於雁行。」即同時指出在唐末華麗主流外，尚有閒遠、沈摯、繁富、奇闢的表現。

總之，晚唐詩風雖主雕琢華麗，但若能不失情志，亦能受到館臣稱揚。

三、古文譜系及其意義

(一) 勾勒韓愈的先行者

唐人對古文的講揚與發展，是文學史上常受討論的議題，今人亦多以胡適所造的「古文運動」一語涵蓋之^{⑥2}。《總目》也建構了古文發展的歷史圖像。〈昆陵集提要〉^{⑥3}云：

⑥1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別集類四、〈韓內翰別集提要〉，頁4（冊）—81。

⑥2 參見羅聯添：〈論唐代古文運動〉，收入氏著：《唐代文學論集（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5月），頁3-32。

⑥3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44。至於館臣引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條。至於所引王士禛說法，未指明出處，不得確知，然《香祖筆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云：「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又卷

然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斷雕為樸，數子實居首功。《唐實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案此據晁氏讀書志所引）特風氣初開，明而未融耳。士禎於華路籃縷之初，責以制禮作樂之事，是未尚論其世也。

這段文獻一則指明唐代文格轉變的時間自元結、獨孤及開始，經蕭穎士、李華，到韓愈、柳宗元則為極盛，故文格改變的時間晚於詩格。既然韓、柳古文為「極盛」代表，那這段時間應指大曆、貞元，乃至元和之間⁶⁴。

另者，為強化古文作家的譜系，館臣援引晁公武的說法，並反駁王士禎對於獨孤及的批評。當然，建立文學譜系，在唐代已約略形成。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⁶⁵提及：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驚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

梁肅持文章三變之說，分別訂定變革人物為：一變陳子昂，二變張說，三變李華、蕭

六：「唐人作集序，例敘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況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為法。」俱見貶抑獨孤及文章。

⁶⁴ 古文極盛的時間，本文據《新唐書·文藝傳序》指出「大曆」、「貞元」，據〈蘇氏文集序〉「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指出「元和」而言。分見【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頁5725-5726；【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3月），卷二〈居士集二〉，頁121。

⁶⁵ 【清】董誥等：《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卷五一八，頁52-61。

穎士、賈至、獨孤及。其中的第三變，則為古文作家。時入宋朝，古文的代表作家的榮光，則往韓愈及其弟子聚焦，如歐陽修〈蘇氏文集序〉：「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⁶⁶《新唐書·文藝傳序》甚至有唐文王法的判斷⁶⁷：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孺嚆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新唐書》述及唐代時間較長〈補闕李君前集序〉，其三期分別為高祖、太宗以降（含中宗、睿宗、武後等朝），第二期為玄宗以降（含肅宗、代宗等朝），第三期為代宗大曆以降（含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第一期約一百年，是追求「絺句繪章，揣合低卬」等詞義與聲韻屬對精美的時代，以王勃、楊炯為代表。第二期約五十年，乃針對前代只求雕琢而沒有「理致」的文風，開始產生反動。此期以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為代表。⁶⁸其中「崇雅黜浮」的具體意涵，應在對治「雕琢」「索理致」的文弊；而在正面表現上，其完成了「氣益雄渾」的剛強風格。第三期時約一百四十年，承續第二期的反動，待至韓愈

⁶⁶ 同註 64 所揭書。

⁶⁷ 同註 64 所揭書。

⁶⁸ 《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列傳第五十，〈蘇頲傳〉：「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頁 4402-4403。「景龍」為中宗年號（707-710），可知玄宗時張、蘇二人已有才名，並稱大手筆殆自景龍後。

等人，則成就一套具有「王法」特質的唐文。⁶⁹。「王法」的建立，乃仰賴時代美才「擣齋道真，涵泳聖涯」，提供作品「理致」的內涵。總之，韓愈的文學地位逐漸受到特別關注，並且固化為習見⁷⁰。而清高宗為了修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儲欣《唐宋十大家文集》的不足，故有《御選唐宋文醇》之作，其亦盛推韓愈，〈御選唐宋文醇序〉云：「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⁷¹《總目》雖也有「杜甫、韓愈詩文亦冠絕古。」（〈王子安集提要〉）⁷²之說，但是館臣在〈毘陵集提要〉一方面脈絡性地重構唐代古文發展，尤其是韓愈的前行者歷史，另方面批評王士禛對於獨孤及評價不公，並主張應以「論其世」為評價的視野與態度，都展現出在考證基礎（據晁公武引《唐實錄》言）上，調整歷史敘述的客觀意義。

至於唐代古文的起因，《總目》以文章沿襲「六朝之體」為說；而「六朝之體」的特質，則以「雕」字收攏。至此，古文的概念，含藏著對反「雕」的意義，實屬語言表現的層級，〈次山集提要〉⁷³持同樣看法：

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春陵行〉，稱其可為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

⁶⁹ 【宋】魏了翁的舉文〈唐文為一王法論〉，則闡述史官論韓愈的文章成就，足以使唐文為一代王法的道理，可見南宋人亦接受北宋人對唐代古文的評價意見。見氏著：《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一。

⁷⁰ 周彥文先生認為自南宋開始，選集就常以後世所謂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作品為範式，到明代的科舉考試更是如此。此觀察或可成為韓愈地位穩固的原因之一。見氏著：〈古文運動的反思與重構〉，收入中國古典文學會、輔仁大學中文系主編：《建構與反思》（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7月），頁293-352。此外，陳友冰先生也曾從唐代科舉考試的角度，說明科舉考試幫助和推進古文的發展，見氏著：〈論唐代科舉制度在古文運動中的作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3期。

⁷¹ 【清】清高宗：《御選唐宋文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序〉。

⁷²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6。

⁷³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39-40。

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為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

館臣援引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的詩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上「元子十卷、琦玕子一卷、文編十卷」條、高似孫《子略》卷四「元子」條評語，綜謂元結為唐代古文的開創者。此開創的意義，在於異於時流而「變排偶綺靡之習」。其中，晁公武觀察說：「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隱自謂與聱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詞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晁氏從韓愈往上尋索，肯定元結與獨孤及引領古文發展的地位，就成為館臣繼承的重要意見。

事實上，《總目》論及變格六朝之體的作家，尚有陳子昂。〈陳拾遺集提要〉以「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奮發自為，追古作者。」⁷⁴為總評，又主張在評價陳子昂時，需分別文體予以討論：「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論事的書疏體類，實近於古，其「古」應相對「排儷」而言，此乃追古之作。不過，館臣雖認為陳子昂「奮發自為」，且有「疏樸近古」之作，但整部文集看來，「是集之傳，特以詞采見珍。譬諸蕩姬佚女，以色藝冠一世，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因此，在館臣的認知中，真正的古文起點，就應定於元結、獨孤及了。

此外，尚須留意的是，館臣並不因重視古文發展，而片面取消排儷之詞的價值。

《總目》曾稱許張說「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蘇頌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張燕公集提要〉）⁷⁵，論張九齡「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文筆宏博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曲江集提要〉）⁷⁶，論陸贄「宋祁作贊傳論，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

⁷⁴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8。

⁷⁵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29。

⁷⁶ 《總目》，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別集類二，頁4（冊）—31。

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贊文十餘篇以為後世法。……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有足為萬世龜鑒者，故歷代寶重焉。」（〈翰苑集提要〉）⁷⁷ 據此可知，文章是否能夠深切著明古今政治得失，成為萬世龜鑒，比起是否以排偶行文更為重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總目》文學思想的幾個要點：第一、唐代古文的发展，起於元結，極盛於韓愈、柳宗元。第二、古文相對於時文而言⁷⁸，時文乃沿襲「六朝之體」，具「排偶綺靡之習」，故「古文」乃為對反六朝綺靡風格而言。第三、館臣不因肯定古文變格六朝排偶之風，而一味取消排偶之作的價值。因此，脈絡化韓愈的文學史地位、彈性地面對不同時代的文學風格，都是館臣文學思想重要的特質。

（二）描繪韓愈的並行者與繼行者

《總目》涉及韓愈的並行者或繼行者的資料，臚列於下。

A. 〈劉賓客文集提要〉⁷⁹：

（劉禹錫）其古文則恣肆博辨，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為軌轍。

B. 〈張司業集提要〉⁸⁰：

（張籍）其文惟《文苑英華》載〈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相其筆力亦在李翱、皇甫湜間，視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剗雕，亦為勝之。

C. 〈皇甫持正提要〉⁸¹：

（皇甫湜）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

⁷⁷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47。

⁷⁸ 〈四六法海提要〉云：「唐韓愈亦斷斷有古文、時文之辨。」則以「古文」與「時文」相對。《總目》，卷一百八十九、集部四十二、總集類四，頁5（冊）—79。

⁷⁹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4。

⁸⁰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5。

⁸¹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5。

D. 〈李文公集提要〉⁸²：

（李）翱為韓愈之姪壻，故其學皆出於愈。……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為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為篤論。

E. 〈歐陽行周集提要〉⁸³：

今觀（歐陽）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甚遠。……然詹之文實有古格，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韓愈為〈歐陽生哀辭〉，稱許甚至，亦非過情也。

F. 〈李元賓文編、外編提要〉⁸⁴：

（李觀）與韓愈、歐陽詹為同年，並以古文相砥礪，其後愈文雄視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僅存，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獨擅其名。

（陸）希聲之〈序〉則謂：「文以理為本，而詞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詞，故詞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詞。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詞。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質。」今觀其文，大抵瑣瑣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為一格，而鎔鍊之工或不及，則不幸早凋，未卒其業之故也。然則當時之論，以較蛻、樵則可，以較於愈則不及。希聲之〈序〉為有見，宜不以論者為然也。顧當瑣瑣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鬪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非餘子所及。

G. 〈沈下賢集提要〉⁸⁵：

（沈亞之）其文則務為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

⁸²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7。

⁸³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8。

⁸⁴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59。另【唐】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見【宋】姚勉：《唐文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十三。

⁸⁵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63。

H. 〈樊川文集、外集、別集提要〉⁸⁶：

（杜牧）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衮《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敘〉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視長慶體矣。

I. 〈文泉子集提要〉⁸⁷：

（劉蛻）其〈文塚銘〉最為世所傳，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奇奧，險於孫樵而易於樊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軌。又詞多恚憤，亦非仁義藹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為纂組俳儷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謂特立者矣。

J. 〈孫可之集提要〉⁸⁸：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其〈與友人論文書〉又復云。然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群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為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為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讀書志》引蘇軾之言，稱「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其論甚微。毛晉跋是集，乃以軾言為非，所見淺矣。

在上述十則文獻中，我們可發現幾個要點：第一、古文的產生，仍是為了變格當時「纂組排偶」（E）、「雕章繪句」（F）、「駢偶鬬工巧」（F）、「纂組排偶」（I）而然。第二、對於「古」的涵義，亦從內容、宗旨的層次，予以掌握（J）。第三、與韓

⁸⁶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69。

⁸⁷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74。

⁸⁸ 《總目》，卷一百五十、集部三、別集類三，頁4（冊）—76。

愈並行者，除了受人熟知的柳宗元外，尚有歐陽詹、李觀、劉禹錫。歐陽詹、李觀與韓愈同在貞元八年擢進士第，且「以古文相砥礪」，但是歐陽、李終不及於韓，文格接近於後起作家劉蛻、孫樵。縱然如此，館臣仍採陸希聲的意見，判定歐陽文學價值高於劉、孫。第四、韓愈之後，李翱得韓愈之醇、皇甫湜得韓愈之奇崛⁸⁹。然奇崛之風尤盛，沈亞之、劉蛻、孫樵俱為接續者，而其中孫樵更明言得文章真訣於來無擇、皇甫湜、韓愈一系。至於李翱一系，則未有明言⁹⁰。

就上所論，館臣雖然肯定韓愈古文，但未因此簡化並行者的價值，足見其文學思想具有包容性。此外，〈文泉子集提要〉謂劉蛻「而所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軌。又詞多恚憤，亦非仁義藹如之旨。」據此可知，館臣心中的「古」，實非限於時間意義下的「古時」，流為與「今時」並峙的觀念，而是帶著濃厚的價值判斷。換言之，構成古文之「古」的內涵，應為「仁義藹如之旨」，這實以儒家思想為基底，其立場接近於韓愈。可是，唐代古文家對於傳統學術文化的掌握，並非全然相同，至少柳宗元、劉禹錫「始終徘徊釋老間」⁹¹，所以館臣的文學思想又帶有排他的氣味。

錢穆先生〈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一文曾指出⁹²：

⁸⁹ 《總目》以皇甫湜〈答李生書〉「氣盛攻辨」，斷言其得韓愈之奇崛，雖未進一步舉證細說，但〈答李生書〉確有文章貴奇的主張，故視湜得愈之奇崛，亦無不可。至於李翱，〈總目〉僅抽象地說：「（李翱）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便證其得愈之醇。羅聯添先生曾舉蘇洵〈上歐陽內翰書〉中「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證明李翱得韓愈醇厚平易，此風格並轉遞至北宋歐陽修，或可參考。見氏著：《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7月），頁250。

⁹⁰ 羅聯添先生認為杜牧取韓愈醇厚與衍，應與李翱同調。同前註所揭書，頁255。

⁹¹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見羅聯添：《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9月），頁1033。

⁹² 同前註所揭書，頁1025。又何寄澎先生曾分析韓文的作法，得出「好奇求新」的結論，見氏著：〈韓愈古文作法探析〉，《唐宋古文新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4月），頁33-95。姑且不論韓文技法的養料是如錢穆先生所說融化詩賦風神而來的，或如何寄澎先生所論從史遷、左國、孟荀而來，總之非一「樸」字所能盡涵。

然則韓柳之倡復古文，其實則與真古文復異。一則韓柳並不刻意子史著述，必求為學術專家。二則韓柳亦不偏重詔令奏議，必求為朝廷文字。韓柳二公者，實乃承於辭賦五七言詩盛興之後，純文學之發展，已達燦爛成熟之境，而二公者，實乃站於純文學之立場，求取融化後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純文學之閭域，而佔一席之地。

錢先生認為韓、柳的散文，既不成為子部或史部的著作，又不只限於廟堂文書，尤其是書牘、贈序、雜記、雜說等體類，能有一套「琢句鍛字，不格設色，匠心密運，有更難於尚偶儷者之所為者。」換言之，「古文」雖可對反排儷文風而言，但又非「斲雕為樸」可以道盡的，「古文」與建安以下的文學關係，在《總目》的論述中，無疑受到壓縮，因此實有不足之處。若不正視古文創作中含有其他向度的文學意義，那麼恐怕也難以解釋何以「斲雕為樸」的古文特色，可以產出「奇崛」風格的接續者？

四、結語

綜合上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 (一) 《總目》別集類〈提要〉的詩歌史圖像，可分別以「俳偶」、「渾厚」、「諧雅」、「雕琢」予以掌握。
- (二) 館臣對於「俳偶」、「雕琢」的詩風，視其程度而有褒貶。至於褒揚的標準，在於儒家詩學的「溫柔敦厚」、「興觀群怨」（參見〈御選唐宋詩醇提要〉）。換言之，館臣能夠正視文學創作由簡樸入於繁華的歷程與結果，並且予以包容。只是，這包容並非無核心價值的開放型態。
- (三) 館臣認為開元、天寶（即盛唐）為唐詩的轉變階段，其風尚以氣象渾厚涵蓋之，此應以李、杜為代表（參見〈御選唐宋詩醇提要〉）。王、孟一派雖受館臣重視，但難以渾厚稱之。又王昌齡等邊塞詩風，則未見著墨。
- (四) 盛唐與中唐之間，為另一轉變階段，即詩風趨於「浮響」。
- (五) 中唐元、白詩因淺切、淫靡，可謂「浮響」的表現，因此不受館臣喜好。至於

韓、孟一系，倒受青睞。但這基本觀點，又與《總目》若干〈提要〉悖背。

- (六) 《總目》肯定韓愈古文「冠絕一時」，但也描繪韓愈與前行者的關係，此異於北宋以降獨尊韓愈地位的論述。
- (七) 《總目》「古文」的概念，至少包涵三層意義：第一、時間意義，即相對於今時之文。第二、語言表現意義，即相對於排偶之文。第三、宗旨意義，即指古文應具儒家仁義思想，並協聖賢之軌。
- (八) 在「古文」的語言表現意義上，「斲雕爲樸」的說法，相對壓縮了唐代古文與前代文學的繼承關係。
- (九) 在「古文」的宗旨意義上，壓抑了唐代古文作家不同的學術取向。
- (十) 《總目》雖重視唐代古文的發展與價值，但未全然否定華麗文辭的價值。

【附記】

1. 本文原宣讀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第 11 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特約討論人周彥文教授悉心評論，啟發之處甚多；復獲學報匿名審查委員諸多建議，實有益本文修正，衷心感謝。

2. 本文獲國科會補助完成【補助編號 97-2410-H-004-138-MY3】，一併致謝。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The narrations of the summari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Books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Tseng, Shou-ch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Books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is an important record of written works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scholars conducted research from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such as editing, supplementing and modifying, many important advancements were achieved. Up until the 1980's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gradually changed;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ure and thinking shown in the books.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is change. The narr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s the scope of my research. My research will reconstruct the officials work on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from the Tang Dynasty collections of summaries, and interpret the implicated meaning of their thinking. Because summary in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Books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were composed according to existing books, this led to the form

of the complete idea seem unordered and hidden. I will reconstruct their narr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explore the complete content of their thinking. Thus, I use the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as a topic to open discussion.

Keywords: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Books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history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collections, ancient writings